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杨昕怡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城乡融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民生保障的基石,是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的关键抓手,也是弥合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基础。基于261个地级市2000—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数理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系统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通过整合Devarajan财政支出框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出规模与效率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效用,而税负与行政支出则产生了抑制效应;中央转移支付通过平衡地区资源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户籍制度改革将转移支付基准从户籍人口转向常住人口继而缓解了流动人口服务缺失;专项资金通过精准激励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结构方程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市便利性显著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环境污染则构成阻碍;财政支出和户籍改革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驱动力,专项资金因政策时效性与数据限制效应未达显著;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可靠性,且专项资金关联性初显。研究突破了单一视角局限,融合财政、制度与政策变量构建综合模型,揭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融合的非线性影响,强调“市场-政府”协同机制,主张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要素流动潜力,为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支持;户籍制度改革;市民化专项资金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持续聚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导向,明确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缩小城乡差距中的关键作用。面对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深入贯彻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强化相关举措,不仅是重点领域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到2035年发展的

总体目标,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这一目标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坚定决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2]。这一论断深刻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积极回应,以及将人民利益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执政理念。202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

引用文本:杨昕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2):147-16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10,19JZD003);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A024)

作者简介:杨昕怡(1996—),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乡融合研究。E-mail:954995014@qq.com

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3]。在此背景下,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目前,学界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联展开了多维度探讨:其一,财政与制度因素方面,财政分权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但户籍制度对城乡资源流动形成双向掣肘。郑济洲等提出财政分权、公共服务均等化均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4];陈旭东等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评估数字赋能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效应^[5];甘行琼等指出户籍制度对城乡资源流动存在双向作用,需结合财政体制改革破解壁垒^[6];朱德云等聚焦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剖析区域财力差异导致的补偿失衡问题^[7-8]。其二,城乡融合机制方面,研究多从要素流动视角切入,强调经济、社会、生态多维均衡,部分聚焦内涵界定与测度方法,如翁列恩从“公共价值—行动导向”两个维度理解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治理融合的概念内涵^[9],部分研究则分析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机制^[10]。其三,影响因素方面,土地资源错配抑制融合效率,而基建完善与数字化赋能可强化城乡联结。赵伟等揭示土地资源配置对融合的传导路径^[11];何雄浪等分别验证了基建与数字化的驱动效应^[12-13];张杰等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创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数字基建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14]。与此同时,量化工具创新推动研究从宏观叙事转向精准政策干预,如沈扬扬等以居民中位收入重构相对贫困测度,揭示经济融合差异^[15];杜启平通过人口流动趋势动态评估城乡融合进程^[16];辛金国等基于浙江地市数据,构建了空间设施与生态差距指标^[17]。综合已有成果可知,学者在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时通常侧重于某一特定领域或视角,存在静态分析、单维测度、要素驱动路径研究过度依赖截面数据等局限,易受异质性因素影响而难以展示整体模型。

本研究以城乡融合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互动机理为核心,基于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2000—2021年)与全国26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财政支出—户籍改革—专项资金”联动的结构方程模型,系统解构财政资金支持、户籍制度松绑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三大政策工具对城乡融合的作用路径。此次研究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框架下,融合经济学理论建模与社会学实证分析,揭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要素流动制度成本、增强政策协同性的动态传导机制。一方面,中央转移支付的精准配置与户籍制度改革的渐进突破,可显著消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落差,加速农业人口市民化进程;另一方面,专项资金通过“激励相容”设计激活地方政府服务供给动能,与“财政—户籍”政策形成互补效应,共同塑造“制度韧性—要素适配”的双轮驱动格局。实证层面,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测度区域异质性下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边界发现,东部地区更依赖市场化资源配置,而中西部则需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补偿功能。理论层面,创新性提出了城乡融合的三维协同解释框架,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静态均衡分析转向动态政策干预评估,拓展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资本”双轮驱动解释范式。实践层面,为优化转移支付分配公式、设计户籍改革梯度推进方案、构建专项资金绩效评估体系提供了依据,推动形成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服务同质的城乡融合新模式,为实现城乡居民权利平等化、发展机会均等化提供可操作的政策范式。

二、理论分析与作用机制

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准模型构建

作为财政支出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Devarajan等用数学语言构建了财政支出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18]。本研究沿袭这一经典逻辑,并在其基础上增加了户籍制度改革与专项资金支持的内容。具体而言,在基准模型部分,剖析农村转移人口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农村转移人口的决策过程,并逐层加入中央转移资金支持、户籍制度改革、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这3个核心要素,采用数理经济学方法刻画了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单位水平变化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边际影响。

本研究的基准模型将地方政府支出细分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q_1 与行政性支出 q_2 , 同时将地方政府的收入划分为源于生产活动的税收 p_1 与源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p_2 。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在于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迁移,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劳动力的迁徙。近年来, 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较快, 大规模人口脱离农业生计进入城市寻求工作机会, 这一过程中, 即将发生户籍转移的农业转移人口主要关注地方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而这些要素都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q_1 。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总量制约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占比也反映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 地方政府针对生产活动所征的税收, 也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效用。据此, 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 其面对的效用水平 v_1 为

$$v_1 = \frac{q_1 / (q_1 + q_2)}{p_1} = \frac{q_1}{p_1 (q_1 + q_2)} \quad (1)$$

式中: v_1 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用水平; $q_1 + q_2$ 为地方政府支出; p_1 为生产活动产生的税收; p_2 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 两者之和仍为 $q_1 + q_2$ 。

农业转移人口的效用来自现有资源投入水平和税负压力, 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充足与否直接影响了当事者所感受到的效用水平, 地方性法规是否完善以及能否得以执行也反映着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 地方性法规及其针对生产活动所征税金同样会影响到民众感知效用水平。通过基准模型, 能够深入理解城乡融合发展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其将农业转移人口感知效用水平与城乡融合发展联系起来, 并突出了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进一步将源自中央政府的支付转移纳入分析框架, 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效用水平既受到政府生产建设支出规模的影响, 也受到转移支付规模的影响^[19], 使转移支付的净流入能够影响人口流动水平。因此, 农业转移人口面对的效用水平为

$$v_1 = \frac{q_1 / (q_1 + q_2)}{p_1 / (p_1 + p_2)} = \frac{q_1 (p_1 + p_2)}{p_1 (q_1 + q_2)} \quad (2)$$

式(2)描述的基本框架包含两方面的关键信息: 一方面, 农业转移人口感知效用水平是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总量的增函数, 同时受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占比的影响; 另一方面, 感知效用水平与课税强度之间呈现负相关, 同时也受到地方政府收入结构的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收入结构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感知效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和迁移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而税收和行政性支出则在一定程度上对感知效用产生负面影响, 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则在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 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中央转移支付模型构建

中央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或特定领域提供资金支持的一种财政安排。中央转移支付作为一种财政调配工具, 通过从相对富裕的地区向相对贫困或发展滞后的地区提供资金来实现资源再分配。该支持形式能帮助弱势地区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有利于缓解不同地区之间因资源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因此, 转移支付将显著影响地方的行政支出, 通常对于教育等关键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更为显著, 从而对于人口流动中的居民获得感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这种支付形式旨在促进区域之间经济平衡、社会公正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而使得地方之间差距缩小, 相应地, 流动人口在效用感知水平上的差异性缩小了, 共性扩大了。地方政府收入中, 假定税收是常住人口规模 r_1 的函数^[20], 而源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依赖于当地户籍人口规模 r_2 , 因此,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为 $r_1 p'_1$, 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收入为 $r_2 p'_2$, 其中 p'_1 为人均生产总值所形成税收收入, p'_2 为人均财政支出中央拨付部分。综上, 在纳入中央转移资金支持的分析框架后, 流动人口所感知到的效用为

$$v_1=\frac{q_1(p_1+p_2)}{p_1(q_1+q_2)}=\frac{q_1(r_1p_1'+r_2p_2')}{r_1p_1'(q_1+q_2)}\tag{3}$$

式(3)体现了在考虑人口规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农业转移人口感知效用的影响。进一步地,农业转移人口感知效用会决定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迁移,从而影响城乡融合的过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导致人口流动这一议题,前人的研究已提供了一定成果借鉴,如梅建明等通过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揭示了基本公共服务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空间聚集的过程,结果显示本地公共服务是吸引农业转移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其中教育投入和医疗投入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周边地市带来负面外溢效应,但在中西部地区则存在医疗卫生投入对于相邻地市的正向外溢效应。此类研究与本研究的数理分析框架契合,因此将代表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差的流动人口规模 r_3 引入模型:

$$r_3=r_1-r_2\tag{4}$$

并以 k 表征基于公共服务感知水平发生迁徙的流动人口系数,则有:

$$r_3=kv_1\tag{5}$$

据此可以根据式(3)构建逻辑闭环:

$$r_1=r_2+k\frac{q_1(r_1p_1'+r_2p_2')}{r_1p_1'(q_1+q_2)}\tag{6}$$

式(6)的框架中包含双重信息:一方面,人口作为地方政府税收和中央转移支付的基础,是影响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政府收支互相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支出带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变化,又进一步影响了流动人口的迁移决策。因此,人口与政府收支互相影响的逻辑关系在该框架中得以体现。为凸显基本公共服务和城乡融合变量的制约关系,整理式(6)可得:

$$r_3=-\frac{kr_1(p_1'+p_2')q_1}{(r_1p_1'+kp_2')q_1+r_1p_1'q_2}\tag{7}$$

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关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一阶偏导可得:

$$\frac{\partial r_3}{\partial q_1}=\frac{kr_1(p_1'+p_2')}{(r_1p_1'+kp_2')q_1+r_1p_1'q_2}-\frac{kr_1(p_1'+p_2')q_1(r_1p_1'+kp_2')}{[(r_1p_1'+kp_2')q_1+r_1p_1'q_2]^2}\tag{8}$$

式(8)呈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联,等式右边即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引致的城乡融合发展的变化, $\frac{\partial r_3}{\partial q_1}$ 由人口、地方政府行为、中央政府行为等多个参数决定,其具体的取值将在实证分析部分予以进一步测算。

3. 促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综合性模型构建

户籍是国家对个体进行登记管理、划分行政管辖范围以及提供社会经济服务等方面所确定的身份信息,因此,就传统做法而言,户籍人口是行政区级别设置与部门设置的关键要素,这种做法一方面来自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高度限制,使基本公共服务规模能够匹配于户籍规模;另一方面则源于常住人口精确测度的困难。由于人口规模与地方政府绩效密切联系,所以评估人口规模受到地方政府效率的制约,高频率的检测成本较高,因此难以获得精确的常住人口规模数据。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获取财政转移资金,其测度标准依赖于户籍人口规模。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缺失,祝仲坤等分析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发现,流动人口获得的公共卫生服务与本地人口存在显著差异^[21]。随着对户籍制度认识的深化,该类实践也正在发生转变。伴随户籍制度改革,更多脱离于户籍的人口流动监测手段得到发展。

当前,身份证制度已得到广泛实施,流动人口身份认证也更为便利。据此,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和资金支持形式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从过去的依赖户籍人口规模,逐渐转变为基于常住人口规模。相比之下,基于常住人口规模评估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际人口,保障人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支持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因此,对于各级财政部门来说,在转移支付时需要考虑使用何种标准扩大转移支付对象、转移支付对象的数量又是否真正能够反映真实人口增加带来税收规模扩张和基本公共服务均摊等相关效应。

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令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为常住人口规模 r_1 的增函数,则居民所能感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效用 v_2 为

$$v_2 = \frac{q_1(p_1+p_2)}{p_1(q_1+q_2)} = \frac{q_1r_1(p'_1+p'_2)}{r_1p'_1(q_1+q_2)} \quad (9)$$

用 Δv 表示户籍改革前后居民所能感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效用的差别,即:

$$\Delta v = v_2 - v_1 \quad (10)$$

根据式(3)与式(9), Δv 为

$$\Delta v = \frac{q_1p'_2(r_1-r_2)}{r_1p'_1(q_1+q_2)} = \frac{r_1-r_2}{r_1} \cdot \frac{q_1}{q_1+q_2} \cdot \frac{p'_2}{p'_1} \quad (11)$$

式(11)表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基础从户籍人口转为常住人口,居民所感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效用会因此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人口结构,即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当中央政府将转移支付基础从户籍人口改为常住人口时,居民所感知到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效用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受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等因素影响。如,在高流动性地区,由于大量流动人员享受不到与其实际需要相匹配的服务,导致社会资源配置失衡,大城市的户籍价值相对上升,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区域紧张。该变化也受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制约,即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q_1 在总体支出中占比越高,则转移支付基础从户籍向常住调整带来的效应就越明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还取决于地方政府收入结构,如在那些依赖较大比例转移支付资金来维持经济运营并且具有较多非当地户籍居民群体存在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区域更能享受到此类红利。

式(5)表明,以人口迁徙为主要特征的城乡融合发展受到居民所感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效用的正向影响。因此,就数理模型而言,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基础从户籍人口转为常住人口,这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策略会带来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变化,具体变化的方向则取决于人口结构与地方政府的收支结构,这为实证部分的进一步测算提供了理论基础。

4. 城乡融合视角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模型构建

农业转移人口在户籍制度中是一类专有名词,特指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在统一居民户口时则指从农村地区迁往城市或其他非农业工作领域的人口。随着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在现代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转移部分劳动力到城

市可以有效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并创造更多价值。而从转移人口自身的视角分析,将部分从事传统耕种工作且收益较低的人员引导至新兴行业,能够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水平,实现资源再次配置,同时,通过让更多人获得稳定收入、得到良好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福利也是我国城镇化历程中的关键事件。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的设计,目的在于促进城乡融合并弥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公共服务空缺。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中,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异性广泛存在,户籍制度登记与变更往往落后于实际人口流动水平,从而导致实际公共服务不足。罗振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关财政支付受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在时间、空间层面上的不确定性影响,跟随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财政补贴能弥补该空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2]。此类奖励可促进地方政府吸纳转移人口,作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制度补充。此类分摊机制能向农业转移人口社区倾斜资源,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在顶层设计层面,对非本地户籍人口予以政策倾斜,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照顾有利于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支持。在考虑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的模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为

$$p_3 = r'_3 p'_3 \quad (12)$$

式中: p_3 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总量; r'_3 为该情境下的流动人口; p'_3 为人均专项资金规模。此类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专项资金,能够提高地方政府吸引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积极性,调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该假设基础上,居民所能感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效用 v_3 为

$$v_3 = \frac{q_1(p_1+p_2+p_3)}{p_1(q_1+q_2)} = \frac{q_1(r_1p'_1+r_2p'_2+r'_3p'_3)}{r_1p'_1(q_1+q_2)} \quad (13)$$

相应的流动人口可表示为

$$r'_3 = k \frac{q_1(r_1p'_1+r_2p'_2+r'_3p'_3)}{r_1p'_1(q_1+q_2)} \quad (14)$$

考虑到式(4)中3种口径人口规模的关

系,可构建逻辑闭环,将式(14)整理为

$$r_3' = - \frac{kr_1(p_1'+p_2')q_1}{(r_1p_1'+kp_2'-kp_3')q_1+r_1p_1'q_2} \tag{15}$$

基于此,在包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的模型中,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关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一阶偏导为

$$\frac{\partial r_3'}{\partial q_1} = \frac{kr_1(p_1'+p_2')}{(r_1p_1'+kp_2'-kp_3')q_1+r_1p_1'q_2} - \frac{kr_1(p_1'+p_2')q_1(r_1p_1'+kp_2'-kp_3')}{[(r_1p_1'+kp_2'-kp_3')q_1+r_1p_1'q_2]^2} \tag{16}$$

式(16)刻画了在考虑专项资金奖励的情境下,本研究关注的两个核心变量的关联性。

其中, $\frac{\partial r_3'}{\partial q_1}$ 取值的现实意义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单位变化,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城乡融合发展。如式(16)所示,该取值受到人口结构、地方政府行为、中央政府行为、专项资金奖励力度等多个参数决定,这为实证分析的测算提供了数理基础。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城乡融合水平测量

1. 指标选取与变量测度

对研究对象的测度应基于其内涵和外延,并兼顾数据的可得性。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而言,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基本公共服务应为保障人民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从人的生存和健康、尊严和发展以及合理的社会秩序共3个方面阐明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外延。据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包含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的复杂系统,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就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而言,其本质在于要素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由流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城乡在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的有机融合。当前,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多采用省级数据,并构建了丰富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此,本研究进行地级市层面数据的探索,主要使用261个地级市2000—2021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对文献的分析,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

研究从资金支持、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共3个方面来刻画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举措:一是就资金层面的财政支出而言,囿于地级市层面农业支出的可得性,采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省级财政农业支出数据,并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将该数据划分到各地级市,以衡量政府执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财政扶持的强度^[23]。二是就制度建设而言,自《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办发〔2011〕9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颁布以来,户籍制度发生了显著改变,这是政府层面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不同城市在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设计多样,落实时间也有所差别,因此采用虚拟变量表示各城市户籍制度的变化,在相应省份颁布户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前,具体城市的虚拟变量取值为0,颁布后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财政部于2016年印发了《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之后,各省陆续因地制宜颁布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由于奖励资金的具体金额难以查阅,本研究采用虚拟变量对此进行刻画,城市所在省份颁布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前该变量取值为0,此后取值为1。

就城乡融合发展的量化指标而言,其本质在于经济、社会、生态在城乡之间的互动融合与均衡发展。显示性偏好理论认为,人们的行动是其内在偏好和体会的真实表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微观效应是吸引个体“用脚投票”,宏观表现则是农业人口的迁移。因此,本研究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平台获得农业人口转移数据,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测度方式^[24-25]。此外,为了量化不同城市的社会经济情况,也将地区生产总值、人口与环境污染等指标纳入研究框架。

数据采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省市经济发展年鉴》以及相应年份各省环境公报中披露的市级环境数据,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样条插值法予以补充。此次数据来源于多个数据库和统计年鉴,就单个变量而言,其在2000—2021的纵向时间跨度上均保持了数据来源不

变、无统计口径变化产生的度量偏误,据此保证了数据的精度和可信度;就各个变量之间的可整合性而言,来自社会、经济等不同背景的变量对 261 个地级市这一基本单元的定位相同,各变量均用于衡量这一基本单位中的公共服务与城乡融合等相关要素,因此保证了各基本单元的横向同质性以及实证分析的科学性。

2. 研究设计与假设的提出

基于数理模型所展示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构建了相应的实证模型。作为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变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现象,变量选择过程可能会带来内生性问题,为此利用方程组的形式,系统刻画基本公共服务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多元关联。结构方程一方面能对系统中各种效应进行解构,另一方面还具备使用潜变量的优势。与此同时,结构方程模型还可通过路径分析来探索不同变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关系,且提供了丰富的模型拟合度指标,可帮助评估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从而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有助于揭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

对理论模型揭示的影响机理进行抽象处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是核心被解释变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为潜变量,由资金支持、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三要素进行刻画,并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前人在研究城市斥力过程中大多将污染排放与环境质量视为一体^[26],量化城市引力的相关文献也会将信息和运输行业的发展等同于城市便利程度。本研究对污染变量和环境质量进行区别,也在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发展和城市便利性之间进行了区分。综上,采用结构方程特有的潜变量表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环境质量与城市便利性,研究假设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式(8)刻画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联,而关联强度由人口、地方政府行为、中央政府行为等多个要素共同决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对城乡融合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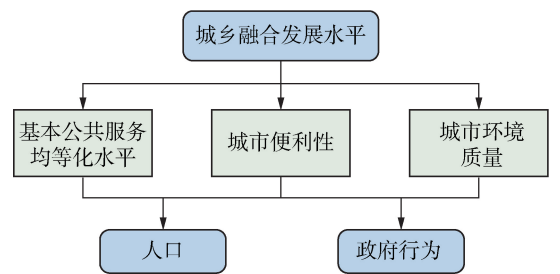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假设的理论框架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水平的城市便利性往往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这使得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并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便利的城市环境也会对农村地区的居民产生示范效应,促进农村地区的设施升级和发展,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

社会公正与均等原则强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够帮助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对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农村地区,政府介入显得尤为重要。理论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仅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还能够促进城乡资源的公平分配。比如,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的专项补贴资金,政府可以有效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可以消除户籍限制,还能在激励机制方面取得进展,从而减小城乡差距,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外,城市环境质量同样对城乡融合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环境质量涵盖了城市的空气、水质、噪声等方面的状况,良好的环境质量不仅能够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还能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和人才。城市环境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形成更具吸引力的居住和工作环境,这不仅促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地区的环境改善,从而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1: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城市便利性与城市环境质量共同构成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是本研究的核心命题,其理论支撑为数理分析部分的式(8)。此假设强调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城市便利性以及城市环境质量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同影响。这一过程的机理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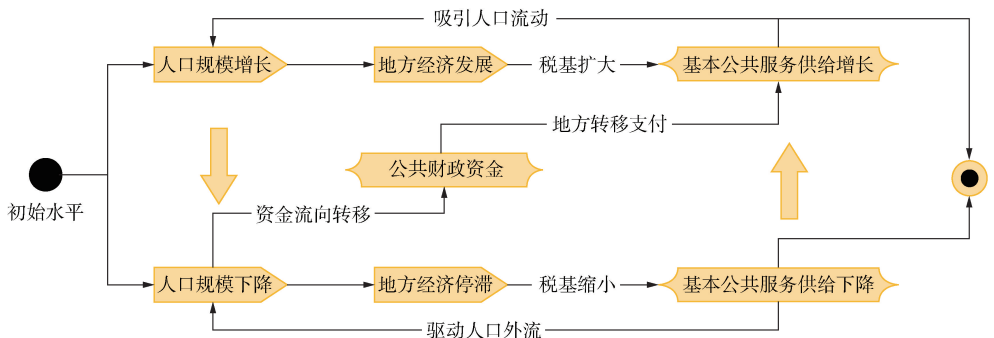


图2 假设1的理论框架

财政支出是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部分源于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在中国,政府通过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等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种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仅限于资金投入的多寡,还包括支出的效率和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以确保公共服务能够真正惠及城乡居民。制度建设是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改革使农村居民能够更便捷地享受到城市的基础公共服务,从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此外,还需考虑地方政府在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时的管理体制和法律保障以及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的建立,以确保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政策引导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如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引导资源配置和社会发展方向,以促进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引导作用不仅限于中央政府层面,地方政府在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政策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政策的灵活调整和实施来适应不同地区的发展需求和城乡差距。相应地,前述数理分析部分的式(11)与式(16)也为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支撑,形成了对于地方财政结构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调整补贴基础之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社会福利纳入面向常住人口范畴的公共服务,也就意味着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将受限较少,更多利用于现有人口规模需求,这种变动或许能够更好地激励地级以上行政区域承担更多责任,满足其日益增长的人口规模及其差异明显

的不同群体需求多元化特征,并立足于此进一步追求基础公共服务以上水平的服务供给。此假设则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测度应从财政支出、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3个视角综合分析。通过合理配置财政资源、完善制度建设和有效政策引导,可以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措施有助于保证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并通过政策引导来优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可从财政支出、制度建设与政策引导3个视角进行测度。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在城乡发展过程中,通过统筹整合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乡居民享有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这一概念涉及从财政支出、制度建设到政策引导等多个视角的测度和评估,以确保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政策效果的最大化。该过程的机理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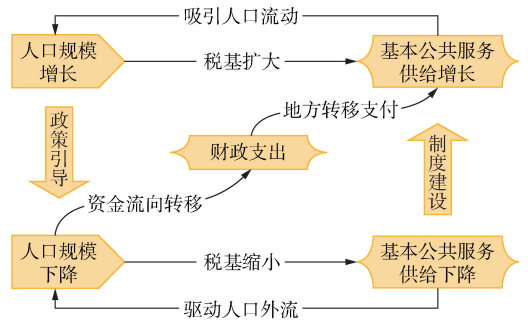


图3 假设2的理论框架

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下城乡融合的基准回归结果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互动机理为研究对象,利用 STATA 程序对 261 个地级市的 5 742 个样本点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结构方程模型对标准化路径系数进行参数估计。

本研究计算了潜变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便利性和城市环境质量)以及各自指标(财政支出、制度建设、政策引导、运输行业发展、邮电行业发展、电信行业发展、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工业粉尘污染)的因子负荷、组合信度和平均提取方差值。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中,财政支出的因子负荷为 0.731,表明财政支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解释能力较强;组合信度为 0.74,表示财政支出与其他指标组成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平均提取方差值为 0.68,说明财政支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解释能力较好。②城市便利性方面,运输行业发展的因子负荷为 0.821,表明运输行业发展对城市便利性的解释能力较强;组合信度为 0.69,表示运输行业发展与其他指标组成的城市便利性潜变量的

内部一致性较好;平均提取方差值为 0.51,说明运输行业发展对城市便利性的解释能力较好。③城市环境质量指标中,水污染的因子负荷为 0.728,表明水污染对城市环境质量的解释能力较强;组合信度为 0.70,表示水污染与其他指标组成的城市环境质量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平均提取方差值为 0.59,说明水污染对城市环境质量的解释能力较好。综上所述,财政支出、运输行业发展和水污染对各自潜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并且与其他指标组成的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表格中第一行为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第一列为解释变量,表格中数字即为以标准差单位衡量的列变量对行变量的影响。大部分标准化系数都可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的 *t* 检验,这为模型整体假设的科学性提供了统计依据。

表 1 结构方程标准化路径估计

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	城市便利性(3)	城市环境质量(4)	财政支出(5)	政策引导(6)	经济发展水平(7)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0.128 *** (0.018 3)						
城市便利性	0.231 *** (0.257 4)						0.263 *** (0.119 5)
城市环境质量	-0.809 *** (0.136 2)						0.508 *** (0.271 4)
财政支出		0.065 *** (0.524 9)					
制度建设		0.062 ** (0.021 1)					
政策引导		0.194 (0.912 5)					
运输行业发展			0.162 *** (0.071 5)				
邮电行业发展			0.535 * (0.091 6)				
电信行业发展			0.157 *** (0.082 1)				
水污染				0.125 *** (0.070 8)			
固体废弃物污染				0.341 *** (0.565 7)			
工业粉尘污染				0.138 *** (0.117 8)			
人口基数					0.250 *** (0.224 8)		
经济发展水平					0.087 ** (0.137 2)		
收入水平					0.045 (0.120 8)		
迁徙人口						0.283 * (0.259 5)	-0.100 *** (0.014 8)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033 *** (0.009 5)
常住人口							0.318 *** (0.014 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1的第1列验证了假设1的有效性。假设1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城市便利性与城市环境质量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均得到证实。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城市便利性对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28,可见随着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城乡融合的趋势愈加明显。此外,城市便利性的融合效应尤为突出,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31。值得注意,环境质量由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工业粉尘污染共同刻画,环境质量取值越高,说明环境污染程度越高。因此,表1第1列的回归结果表明,环境污染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桎梏之一。在此研究领域,亦有相关理论探究,如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城乡融合发展应当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可持续发展理念则认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紧密联系且相互依存的。城乡融合过程中必须平衡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效率,并减少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空间治理强调不同地区之间资源配置、产业布局等方面需要协同规划和管理。在城乡融合中,需要科学规划土地利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注重节约并合理利用资源,通过降低排放物等方式缓解污染问题。

表1的2~4列分别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便利性与城市环境质量这3个潜变量进行了刻画。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而言,资金层面的财政支出与其相关性最为明显,制度层面的户籍改革也对均等化有显著作用。回归结果表明,政策层面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统计学上的关联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来自现实层面和数据层面。资金层面的财政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投入资金来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从而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然而,并非所有投入都能直接导致明显统计学上相关性,可能需要长期积累效果: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施时间较短,可能尚未起

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制度层面的户籍改革也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放宽户籍限制、实现人口流动自由等措施可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囿于专项资金具体金额的数据可得性,采用虚拟变量的处理方法可能导致数据精度降级,未能全面刻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过程。专项资金在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实现市民权益保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尚需时间检验其对于促进公共服务水平整合以及加速城乡融合所带来的具体效果。

表1的5~7列阐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城乡融合过程中涉及的重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财政支出与收入水平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现阶段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并非量入为出,而是在全盘考虑财政收支的前提下对农业发展予以扶助。结构方程模型得到标准路径系数参数估计值能够揭示不同变量之间相互关联情况,从而为深刻理解基本公共服务完善与活跃城乡融合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有效参考依据。总体而言,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标准化路径系数进行的参数估计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得出与数理模型一致的结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较为完善的城市,见证了更为活跃的城乡融合发展过程。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探讨表1中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自助法(Bootstrap)进行稳健性检验。自助法采用非参数的方式,对不同城市与不同时期的观察值进行有放回的重复抽样,从而构建新的数据整体。以新建数据集为基础,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该方法的优点在于:一方面,自助法能有效扩充样本量,弥补我国261个地级市5742个样本点在数量上的欠缺;另一方面,自助法可对原数据点的分布进行有效纠偏,使其分布形式更接近正态分布,进而获得更为精准的置信区间估计结果。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为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提供了支撑。首先,在通过自助法进行数据扩

容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城市便利性对城乡融合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依然稳健,相应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72。其次,城市便利性的融合效应也得以再次证明,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90。值得关注的是,较之基于原始数据的结构方程分析结果,重复抽样后的显著性由 1%降至 5%,这体现了自助法在扩充后的数据基础上获得更为审慎的结果。最后,环境污染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作用依然显著,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14。总体上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5.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表 2 给出了基准回归与自助法这两种样本集合的拟合优度。总体而言,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在可接受阈值内,证明统计数据呈现的现实规律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表 2 中的统计量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计量模型的拟合优度。

表 2 中,Likelihood ratio 中 X^2 检验的 P 值接近于零,可见基于普通回归与自助法的结构方程拟合优度均显著优于相应基准模型。RMSEA 指数下限均小于 0.05,说明两组结构方程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AIC 和 BIC 指数主要用于模型间拟合优度的比较。较之于普通回归,自助法的 AIC 和 BIC 指数拟合优度更高,说明用于稳健性分析的数据点之间呈现了更强的规律性。同样地,就 CD 系数反映的残差而言,自助法的残差较小,说明数据点之间具有更强的同质性。综上,基准模型与基于自助法的结构方程的拟合优度指标均在有效范围内,证明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命题的有效性。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其核心在于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发现,城乡融合成功的关键在于财政支出、户籍制度改革和专项政策支持。具体而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策略分为 3 个方面:第一,资金层面的财政支出,重点是优化资源配置以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等领域,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最重要的抓手。第二,制度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强调消除地域差异,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通过降低劳动力要素流动壁垒提升城乡融合的水平。第三,政策层面的专项支持,一方面明确了我国各级政府促进城乡融合的激励方向;另一方面也为潜在人口迁移提供了资金支持,以人口迁移为核心带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进一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研究发现,城乡融合的发展需要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在引导市场行为 and 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不可或缺。为实现城乡融合,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和制度建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2. 政策建议

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是立足现实、兼具社会与经济融合的多维度发展,融合发展的驱动

表 2 拟合优度检验

拟合优度指标	拟合统计量	拟合统计值	
		基准回归	自助法
Likelihood ratio	p > chi2	0.000	0.000
RMSEA	90% CI, lower bound	0.000	0.000
Information criteria	AIC	5 835.216	2 172.496
	BIC	4 793.862	1 008.682
Baseline comparison	CFI	1.000	1.000
Size of residuals	CD	0.839	0.278

力既包括市场层面的要素累积与效率提升,也包括政府层面的激励设置与壁垒降低^[27]。本研究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经典经济学框架中,纳入政治学文献关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要素,丰富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并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3个要素产生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有了明确的指导意义。本研究认为城乡融合成功的关键在于财政支出、户籍制度改革和专项政策支持,为此制度建设层面应当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机制,实现财政支出在效率与公平上的统一。理论探索层面需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不断深化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机制和路径及其与城乡融合发展关系的认识,并将理论成果深化为具体的政策设计,且进一步细化为有明确目标需求和社会效益的实施策略。

具体而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策略可分为3个方面:资金层面的财政支出、制度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层面的专项支持。

第一,资金层面的财政支出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各级政府要善用“看得见的手”的激励作用,通过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城乡在质量和效率维度上均衡发展。就基本公共服务类型而言,财政支出应重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提升,并对其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给予充分的资金支持,并确保这些资金能够高效、有序地用于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农村医保的“费用高、看病难”问题,应制定适用于低收入人群的专项财政补助,并对医疗团队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与技术外溢提供有力支持。就财政支出资金来源而言,应基于“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原则,在省域内构建责权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财政支出优先顺序而言,政府应提前布局,根据各个地区的困难与禀赋,充分发挥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力,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顺序与人民需求精准匹配,从而进一步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活力。整合信息技术资源,有效打通城乡间信息沟通壁垒,提高偏远地区群众就医求学便利性,同时减轻城市主要人口集聚压力。基于此,关注并加大对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持续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并将其纳入长期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才能真正缓解当前供给不足带来的压力。

第二,制度层面的二元户籍改革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户籍改革的核心在于人民群众不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受到差别待遇。要促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融合发展,意味着打破城市人口的优越感,鼓励人们“用脚投票”,让劳动力根据市场规律在不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消除地域差异需要通过推行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户籍管理机制来实现,在实践过程中,应合理规划,实现配套改革:一方面,应降低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门槛,推进“一站式”办理与线上办理,鼓励有能力、有技术的农业转移人口到城市落户,解决各行业的结构变化带来的城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应降低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的隐形门槛,鼓励人口自由迁移,确保他们能够获得相应权益保障,精简城市人口在农村创业与购房的证明材料,其中包括简化跨地区就业手续、统一社会福利标准、构建完备并覆盖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资源,且为社会资源建立公平分配体系等措施,以确保每个工作者都可以在任何地区安家落户,并享受到同等水平的福利待遇。考虑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此类人口迁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需注重逐步推进的实际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承载能力,通过确定阶段性目标和具体计划保障制度建设的逐步落地,以劳动力的流动带动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政策层面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支持是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措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奖励资金,比财政支出更为灵活,可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当期人口流动趋势进行精准设置。在使用专项奖励资金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为进行奖励的过程中应突出重点、促进

均衡,同时体现差异。首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奖励资金应突出重点,以人口实际进城落户数为核心因素,不仅关注落户的数量,还可采用互联网与大数据等工具,精细化测度人口的劳动力质量、遵纪守法程度及其学习能力与工作潜力,加强对高素质人口的奖励,激励农业转移人口提高工作水平与生活质量,对未来转移人口起到榜样作用。其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奖励资金应促进均衡,针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弱的地区,应增加“机会”层面的倾斜,减少“结果”层面的补助,鼓励落后地区寻找适合的产业与机遇,遏制其“研究并利用好政策”的机会主义倾向。最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奖励资金应体现差异,对跨省、跨市与跨区落户实行差异化的奖励标准,减少流动人口的从众效应,确保人口流动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率,进而实现以劳动力为核心的各项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均衡分配与有序流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4.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1).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5-02-24(1).

[4] 郑济洲,崔翼. 财政分权、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J]. 华东经济管理,2024,38(6):119-128.

[5] 陈旭东,沈利芸. 数字赋能、财政支出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J]. 管理学刊,2024,37(6):93-109.

[6] 甘行琼,刘大帅. 论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体制改革[J]. 财政研究,2015(3):91-96.

[7] 朱德云,刘慧. 中国城乡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22(10):143-160.

[8] 张帆,吴俊培,龚旻. 财政不平衡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12):28-42.

[9] 翁列恩. 基本公共服务城乡治理融合发展:理论

内涵、体制机制与推进策略[J]. 学海,2025(1): 201-212.

[10] 柯福艳. 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与政策启示——以浙江省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2024, 44(8):55-67.

[11] 赵伟,诸培新. 土地资源配置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J]. 资源科学, 2023. 45(11): 2144-2155.

[12] 何雄浪,王诗语. “新基建”对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J]. 财经科学, 2023(11): 105-118.

[13] 顾相君. 以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J]. 宏观经济管理,2023(9):46-53.

[14] 张杰,孔心敏. 数字基建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研究——来自“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管理学刊,2024,37(4):110-125.

[15] 沈扬扬,李实. 如何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兼论“城乡统筹”相对贫困的可行方案[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91-101.

[16] 杜启平. 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农村人口流动[J]. 宏观经济管理,2020(4):64-70.

[17] 辛金国,马帅西.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及门槛效应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 调研世界,2022(8):67-77.

[18] DEVARAJAN S, SWAROOP V, ZOU H F .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 (2):313-344.

[19] 郭威,李泽浩.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J]. 现代经济探讨,2024(1):35-47.

[20] 高珂,王涛.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的宏观效应与中长期有效性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 当代经济管理, 2023,45(10):78-87.

[21] 祝仲坤,郑裕璇,陈淑龙,等.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与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入[J]. 财政研究,2022(7):52-65.

[22] 罗振. 财政转移支付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策略研究[J]. 农业经济,2022(11):74-77.

[23] 周申蓓,夏欣,武翰涛,等. 人力资本、财政农业支出与城乡差距[J]. 统计与决策, 2020(14): 141-144.

[24] 王成利,王洪娜. 不同级别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特征研究——基于分类市民化的视角[J]. 江淮论坛,2020(5):12-17.

[25] 周佳宁,曹铁毅,邹伟. 农地市场化、农村劳动力

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累积循环效应分析[J]. 2015(7):21-35.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4,38(3):31-38.

[26] 余长林,高宏建. 环境管制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隐性经济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4,27(4):97-104.

[27] 徐明,张文博.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治理体系构型[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7(4):97-104.

The Impact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n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YANG Xinyi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has been advancing steadily, with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gradually evolving towa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the urban-rural gap persists significantly. Basic public services serve as the cornerstone of livelihood security, a crucial means for maintaining social equity and stability, and an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and promoting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0 to 2021,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athematical model an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n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Devarajan fiscal expenditure framework and finds that the scale and efficiency of expenditures on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positively impact the utility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Conversely, the tax burden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s exert a restraining effect. Central transfer payments enhance the perceived level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by balancing regional resource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shifts the benchmark of transfer payments from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to the permanent population, thereby alleviating the shortage of services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pecial funds precisely motivate local governments to absorb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and optimize the equalization alloc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dicate that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 convenienc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whil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ts as an impediment. Fiscal expenditure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are the core drivers for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Due to policy timeliness and data limitations, the effect of special funds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robustness test validate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s and the correlation of special funds begins to emerge. This paper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a single perspective and integrates fiscal,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variables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model to reveal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t emphasizes the “market-govern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advocates releasing the potential of factor flow through structural reforms, providing an empirical basis for policy design.

Key words: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fiscal support;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pecial funds for urbanization